

湯一介與中國文化書院

● 陳越光

我和湯一介先生相識於二十世紀80年代後半期，當時我是《走向未來》叢書副主編，為我們新創刊的《走向未來》雜誌（季刊）去找湯先生約稿。第一次共同工作是1989年在北京香山召開的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由中國文化書院、北京二十一世紀研究院（《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轉向實體化的機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香港大學中文系共同發起，研討會的六次全體大會，分別由龐樸、陳方正、金觀濤、趙令揚、湯一介、陳越光主持。而在1991年8月，我被湯先生吸納到中國文化書院擔任副院長，這一任職持續三十年之久；2022年2月起，我擔任院長。所以，我想從「湯一介與中國文化書院」的角度來談談湯先生的事業與人生^①。

一 評價湯一介的四個維度

湯一介（1927-2014）是中國哲學和思想文化界開風氣之先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關於他的生平簡介在網絡和媒體上已比比皆是。現錄2014年出版的《湯一介集》（全十卷）中的「作者簡介」作為概括^②：

湯一介，1927年生，湖北省黃梅縣人。195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後一直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現為北京大學哲學系資深教授。1990年獲加拿大麥克瑪斯特大學榮譽博士學位，2006年獲日本關西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曾創辦中國文化書院、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等學術研究機構。主要著作有《郭象與魏晉玄學》、《早期道教史》、《佛教與中國文化》等，主編《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儒藏》（精華編）、《中國儒學史（全九卷）》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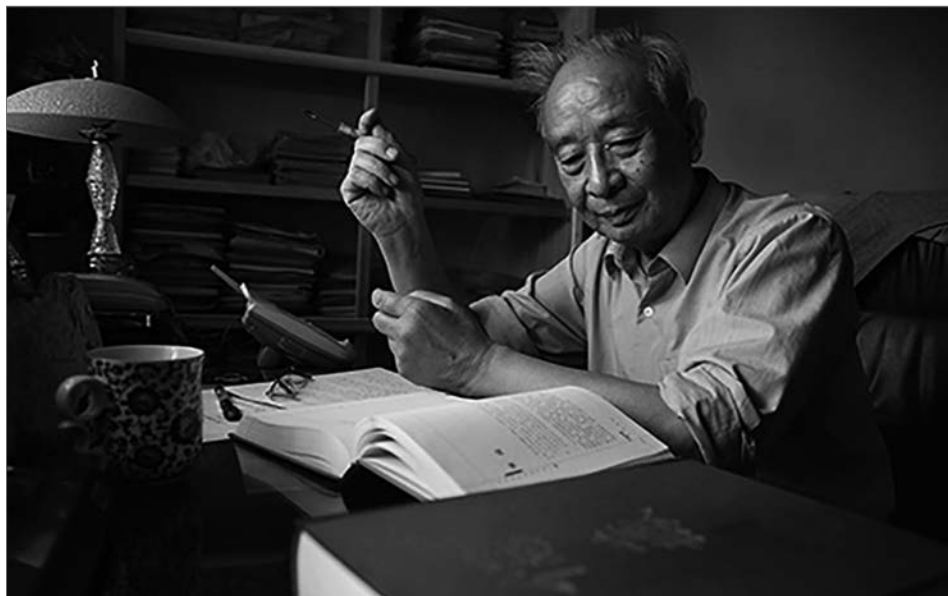
這份簡介應是湯先生最後審定的自我介紹，出於學人自謙，沒有提及所獲榮譽，如曾獲北京大學哲學系哲學教育終身成就獎、孔子文化獎、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等^③。

評價湯先生的生平所為，可以有四個維度：教學生涯、學術著述、編纂出版和社會事業：

第一，以在北大帶研究生為主線的教學生涯。湯一介1951年1月在北大提前畢業，分配至北京市委黨校當教師，五年後調入北大，此後就一直執教於該校，1985年晉升為北大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至2014年去世從教逾六十三年^④。湯先生培養的學生一些已成為中國哲學教學和研究的中堅，如景海峰、楊立華、強昱等。

第二，以專著《郭象與魏晉玄學》為代表的學術著述。湯一介的學術著作涵蓋了道家道教研究、儒家思想、佛教與佛教史、哲學方法論探索、跨文化學的建構諸方面，反映其著作全貌的是2014年出版的《湯一介集》，而1983年出版的《郭象與魏晉玄學》，既是湯一介的第一本學術專著，也是他個人學術思想的代表作。論者指出，「這本著作除了深入到郭象思想的內部去處理『性分』『獨化』『儒道關係』等複雜面向之外，還成為這個時期全面確立中國哲學研究的新路徑的『方法論』讀本」^⑤。

第三，以編纂《儒藏》為代表的學術文獻整理出版。湯一介的編纂出版甚豐，僅2000年以來，就主編八卷本的《國學舉要》叢書、十四卷本的《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九卷本的《中國儒學史》，以及四十卷本的大型叢書《中國文化書院導師文集》，組織編輯出版了七卷本的《湯用彤全集》，等等。而湯先生倡議並主持《儒藏》編纂，更是一項重大的國家學術文化工程——儒家文獻的整理、編纂與研究。目前，《儒藏》精華編已經完成，我們可期待全本《儒藏》的面世。2024年9月9日在中國文化書院舉辦的「湯一介當代學人講座」上，時任《儒藏》精華編執行總編纂的李中華評價道：「古代大賢叔孫豹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三者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就《儒藏》的編纂，於立言說，湯先生誠可當之乎！」



湯一介與《儒藏》（圖片由陳越光提供）

第四，以創辦中國文化書院為代表的社會事業。80年代以來湯一介從事的社會事業眾多，但開始最早、影響最大、歷時最久；共同發起並成為代表人物，關鍵時刻因他而存，因他而持續發展；在他心裏分量最重的就是中國文化書院。這對湯先生本人及其開展的其他方面事業都有影響。他開創的許多文化機構都與書院有關，如他創辦的北大中國哲學暨文化研究所就長期與書院「兩位一體」。他主編的許多叢書是在書院組織，他發起編纂《儒藏》最早的倡議和討論，也是在書院內部進行的。

二 評價80年代中國文化書院的四個維度

二十世紀先後有兩次文化思想運動成為熱潮，引發中國社會尤其是年輕一代的熱切關注、投入。第一次是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以反傳統的倫理革命和白話文運動為標誌，第二次是80年代的「文化熱」，以新啟蒙和文化反思為主潮。回顧80年代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時，人們常把1984年1月出版第一批書的《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同年12月成立的中國文化書院、1987年6月出版第一批書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三個團體，並稱為推動「文化熱」的「三駕馬車」。這幾個團體思想傾向上各有側重，但都着眼於從五四往前走，都着眼於中國的現代化。

評價中國文化書院在80年代「文化熱」中的作為，可以有如下四個維度：

第一，開創民間文化講習。中國文化書院成立後舉辦的第一項大型活動，就是1985年3月4至24日舉辦第一期「中國文化系列講習班」，共二十講。首講由沉寂了三十年的九十二歲傳奇學者梁漱溟先生開講「中國文化要義」，其後，馮友蘭、張岱年、任繼愈、侯仁之、金克木、虞愚、牙含章、吳曉鈴、戴逸、何茲全、陰法魯、朱伯崑、湯一介、龐樸、李澤厚、杜維明、陳鼓應等著名學者陸續開講。聽課學員二百餘人，來自全國各地，每位學員繳納聽課費200元（人民幣，下同）。1985年中國居民平均每人全年生活費支出為673.2元^⑥，200元是當時一個中國城鎮居民近四個月的生活費！四十年前的這次講習班從形式到內容都具有歷史開創性。形式上，這是約三十年後重新開啟了民間性社會講學，今天社會培訓、辦班講課已成為巍巍壯觀的一大產業，源頭可追溯至此；內容上，這是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結束後，第一次大張旗鼓的中國文化主體性宣講，今天的國學研究、「國學熱」也可以尋此歷史性重聚大氣之源。此後，書院的各種辦班不斷，僅1985至1986年間有檔案資料留下來的就有十二個班，而1987年5月至1989年5月為期兩年的「中外比較文化研究班（函授）」註冊學員共12,754人。後來在學術界產生重要影響的郭齊勇、陳衛平、賀衛方等著名教授在80年代都曾為書院的學員。1989年8月2日中國文化書院畢業典禮上，湯一介以這樣一段話送別這屆函授班的學生：「讓我們永遠記住馬克思的教導：只有那不畏艱難險阻，勇於攀登的人，才能達到那光輝的頂點。」^⑦

第二，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在「裏通外國」作為一頂政治帽子的陰影剛剛揮去不久的1984年，中國文化書院就喊出了「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讓世界文化走向中國」的口號，在80年代的民間文化團體中，中國文化書院的國際學術活動、學者交流是最多的，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組織國際學術研討會，大型會議如「梁漱溟思想國際學術討論會」(1987)、「中日走向近代化比較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1988)，與北京二十一世紀研究院等聯合主辦的「『五四』與中國知識份子」國際學術研討會(1989)，與美國新基督教研究會聯合主辦的「中國宗教的過去與現在」國際研討會(1989)，等等；二是邀請或接待境外、國外的學者來華講學、訪問交流，如魏斐德(Frederick Wakeman)、杜維明、林毓生、成中英、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等著名學者。據不完全統計，書院僅1987年就邀請和接待國際及境外學者32人(其中美籍華裔學者成中英來兩次，合計為33人次)，包括美國12人、新加坡7人、日本4人、澳大利亞2人、加拿大1人、意大利1人、香港4人、台灣1人；三是安排導師出去參加各種國際會議和講學，如魯軍1987年去日本參加「國際形而上學會京都會議」，啟功、黃苗子1988年赴港講學，龐樸同年去美國參加「民主與社會正義：東方和西方」國際會議。

第三，組織學術編撰出版。中國文化書院在80年代舉辦各種文化講習班期間，編撰自印教材十五種、600萬字，自行刊發《中國文化書院學報》、《中外比較文化研究資料》和《中國學導報》(雖幾次向新聞出版管理機構申請公開出版刊號，未果)，其中《中國學導報》1987年已向十九個國家的1,100個研究機構和學者寄送。書院設立了出版部、發行部和編譯館，制定了「中國文化書院文庫」五年規劃(1987-1991)，分論著、演講、資料、譯文、古籍、教材六大系列，計劃出版一百種學術著作。1988年8月，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組織編輯出版《梁漱溟全集》，為學者出版個人全集之舉亦具有開創性，1989年5月正式出版第一卷，至1993年6月八卷出齊，共524.5萬字。書院編纂出版了110萬字的《中國文化研究年鑒(1989年)》，填補中國年鑒出版史上的一個空白，湯一介說：「從1988年4月至1989年4月整整用了一年時間，我們編成了這本《1989年中國文化研究年鑒》，它是迄今為止第一本有關中國文化研究的年鑒。」^⑧

第四，建立獨立民間機構。中國文化書院是80年代全國性文化團體中唯一完成機構、經營、管理實體化的，它在1984年首先註冊成立了企業法人機構，然後又成立書院並以「掛靠」方式獲得辦班許可和機構合法性。先於它成立的《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於1988年開始實體化機構建設，但未能完成；後於它成立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也未實體化。這也是1989年下半年《走向未來》叢書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停止出版後，「三駕馬車」只有中國文化書院能存續下來的重要因素。1987年書院登報招聘全職員工，應聘者竟有1,600多人，許多是自願放棄體制內工作來應聘的，200人入選面試，選出46人參加培訓，最終錄用30人；書院1987年度自營收入303萬元，新增固定資

產45萬元，結餘136萬元。這樣規模的民間文化機構，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書院在80年代創建獨立民間機構的創新與探索、遇到的問題與挑戰、留下的經驗和教訓，對今天的中國民間社會組織不僅有歷史價值，而且有現實意義。

三 中國文化書院對湯一介意味着甚麼？

討論「湯一介與中國文化書院」，當然要問中國文化書院的事業對湯一介意味着甚麼？他對此事有怎樣的認定？作出怎樣的付出？又對他的人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首先，看湯先生本人的「認定」。80年代以來，湯先生除了北大校內任職外還有眾多的社會兼職，如中國文化書院院長、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國際道學聯合會副主席、中華孔子學會會長、什刹海書院院長等學術文化機構的領導職務。中國文化書院院長只是他眾多兼職之一嗎？湯先生晚年回顧時說：「我先後做過不少民間學術文化團體的負責人。但只有中國文化書院是我全心全意為它盡力的，這是我自己的事業。」◎「自己的事業」——這就是湯先生心目中對中國文化書院在他人生中的位置認定。而外界認定和他的自我認定也是一致的，例如《湯一介學記》中約三分之二的追憶文章都特別提到湯先生創辦中國文化書院^⑩，可見在學人的心目中，中國文化書院是與湯一介的名字緊密相連的。在80、90年代，「湯一介的文化書院」，幾乎是中國文化書院的別名。

其次，看湯先生對此的「付出」。湯先生在不同文章中多次說到他的學術研究是在80年代才真正走上正軌的，如此算來，在湯先生的學者生涯黃金時間中，為中國文化書院付出時間最多，承受的責任、風險和委屈也最多。責任上，當了整整十六年院長、法定代表人，尤其1989年後的十一年，從方向把握到內部管理，從資金籌措到大項目實施，湯先生處處操心，事事擔責。風險上，1990年初至1993年10月間，書院未獲註冊登記，實際處在「非法」狀態，湯先生不得不頂着法律風險，一邊開展文化項目，一邊四處聯繫掛靠以取得合法身份。承受委屈上，既有80年代末書院內部分裂，湯先生被無端攻擊，受到威脅；又有90年代為書院獲得註冊登記四處奔波而遭受的冷遇，為籌資遇到的出爾反爾。為了中國文化書院，凡此種種，湯先生都一一承擔了。

再者，事業與人，從來是互相成就的，中國文化書院的事業，對湯先生又有怎樣的「影響」呢？這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開展書院的事業，使他不自限在書房和講台，而是立足於大時代下搏擊進取大潮流的大平台，書院導師隊伍匯聚了國內外幾十所名校名所的十幾個學術領域頂尖學者，這對湯先生此後全球化視野和學術領域擴展、學術和文化事業組織，包括倡導並主持編纂《儒藏》都有實際影響。可以說，此舉奠定了湯先生從北大名教授到學界領袖的基礎。學界領袖地位，有的是因開創學科的學術建樹，有的是體制授予的特殊位置，而湯先生是在跨校際、跨專業的學術活動組織中被認可的。

另一方面，在操持辦中國文化書院這件「難事」上，也成就湯先生「事上磨」的錘鍊。湯先生為人謙和包容，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湯先生是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和，他總是溫文爾雅，總是謙和平靜。另外，做學問和當老師，湯先生也有諸事親力親為的習慣。但做事，就得用人，就會有容用捨留之擇；做事，也總要有進退行止的拿捏，甚至不得不有怒目金剛之斷。

我舉兩個例子：1993年，我要辭任中國文化書院副院長，湯先生希望我仍掛着副院長，「沒有精力可以不常務」。我覺得不妥，約了湯先生和孫長江一起談，我提出不掛副院長，以利風氣。老孫同意我的意見，說「越光不會假客氣，掛這個副院長也不能給他增加甚麼」。老孫被稱為書院的「軍師」，一般非學術事務，湯先生多是尊重老孫意見的。但這次湯先生卻堅持自己的看法，他深思熟慮地提出四點：「一我們是朋友；二你是在書院最困難的時候支持書院的，我總希望我們倆合作搞書院；三以後書院還需要你支持；四你一撤會有些人有想法或想進或想退，會不穩定」；「日常工作可不過問，但大活動仍能參加」。此後，他還專門給我寫信說明他的這些意見。這就有了我掛這個副院長三十年後，面臨是否接任院長的猶豫時，樂黛雲先生一句「你不接，就對不起我們老湯了！」的棒喝。

另一件事是1997年10月，中國文化書院接待一個號稱「世界儒學研究促進會」的訪京團，某會長信誓旦旦地當眾宣布要每年捐10萬元給中國文化書院，「請湯院長笑納」，但不到二十四小時就不認賬了。湯先生並沒有一笑了之，而是直接收回給他的顧問聘書，並以個人名義給每位當時在場者致信，通報彼「有背於『誠信』精神」，「很難再進行合作」^⑩。為此等事，本非湯先生所擅，然身在其位，事不避難，在書院這件「難事」上，磨礪了湯先生用人處事深謀遠慮、當斷則斷的領導者意志品質。

四 湯一介對中國文化書院的影響

「歐盟之父」莫內 (Jean Monnet) 的名言——「沒有個人就沒有開始，沒有組織就沒有持續」(Nothing is possible without individuals, but nothing lasts without institutions)，深刻揭示了社會變革與事業創建中個人創造與組織化力量的互動關係。我嘗試從「個人—開始」和「組織—持續」兩條線，來看湯一介對中國文化書院事業的作用和影響。

建立中國文化書院最早的醞釀，起於1984年3月北大哲學系青年教師魯軍創辦民營公司或民間教育團體的一個設想。魯軍找到同事李中華、王守常和北京大學出版社青年編輯田志遠等商量籌劃、各方聯絡，在這個階段湯一介並沒有參與。8月湯一介從夏威夷開會回來，他們聯繫上湯先生並推舉他出面主持。此後的整個籌備期，無論是「中國文化書院」名稱的確立、高規格發起人和創院導師隊伍的組成，還是為落實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批示與教育

部及北大領導會商，湯一介都身在其中並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當然，推動事業「開始」的「個人」，未必只指一個人。沒有湯一介還會有中國文化書院嗎？也許還會有，但必定不是這樣的中國文化書院，無論其內涵、其規格、其規模、其持續性。

在1984年12月中國文化書院成立至1988年的創立與發展期，湯一介作為書院院長，對外是書院的代表人，是重大活動的主持人；對內是書院老中青三代學者承上啟下的中樞之軸，是決策機構「院務委員會」中指導執行機構行政工作班子的代表。在1988年秋至1989年底，書院面臨內部爭執以致分裂的動盪階段，湯先生是院務委員會和多數導師的代表，是穩定書院的決定性人物。在90年代，湯先生是書院人、財、物、事統一的決策者、指揮者。2000年後，湯先生不再擔任書院的院長、法定代表人，但據《中國文化書院大事繫年（1984-2014）》，他依然是出席活動最多的書院代表者^②。同時，他也依然是書院重大決策的靈魂人物，是「持續」推動書院的「組織」發展的精神領袖。

一個機構、一個團體，乃至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合格的領導人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職務性領導人，他們的地位、作用和貢獻都在其任職期間；另一類是歷史性領導人，他們即使已經離任乃至離世，後人依然可以享受着他們的遺產。對於中國文化書院來說，湯一介是歷史性領導人。那麼，湯先生的遺產是甚麼？

2024年12月24日慶祝中國文化書院四十周年大會上，我以〈致敬歷史中的選擇〉為題作院長致辭，說到：

40年來，儘管有無數個放棄的理由，儘管有無數次改變的誘惑，儘管有無數種困難的壓力，但是，「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讓世界文化走向中國」的追求，中國文化書院沒有變；「繼承和闡揚中國的優秀文化，促進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宗旨，中國文化書院沒有變；以理論研究、學術交流、書刊編輯、專業培訓為主的業務模式，中國文化書院沒有變。

這三個「沒有變」，就是我們繼承湯先生等前輩留下的遺產並繼續前行的步伐。



慶祝中國文化書院四十周年合影（圖片由陳越光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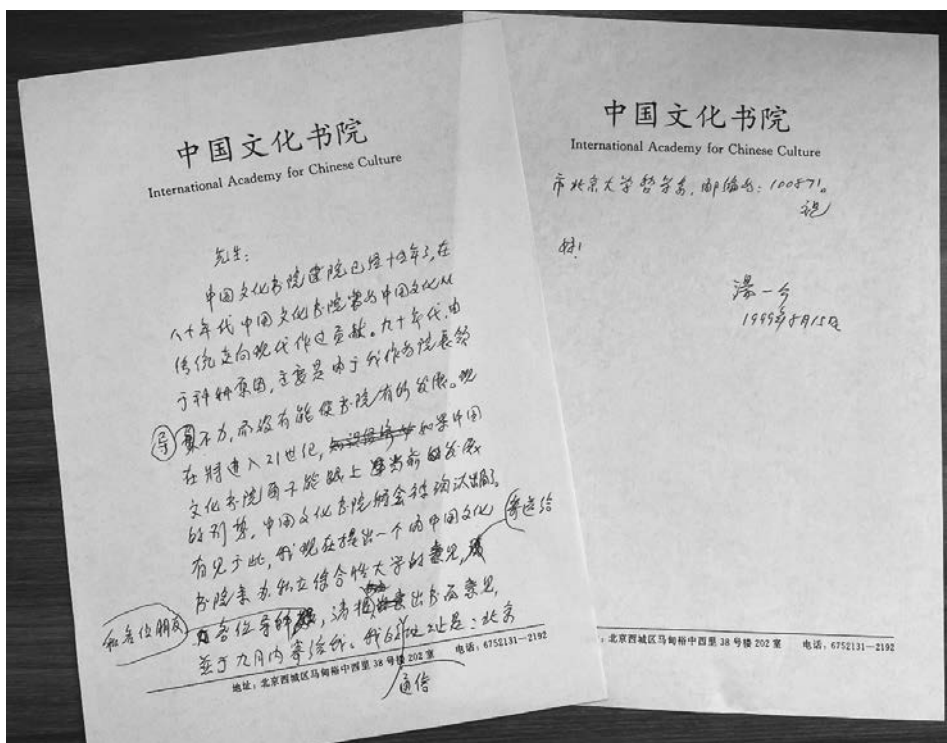
除了舉起中國文化主體性大旗，體現出一條面向未來的傳統主義思想路線，湯先生留給中國文化書院最大的遺產，一是確立了獨立辦院的底線原則；二是確立了開放與融合的風格；三是不以個人學術象牙塔的追求為限，始終懷有社會關切的憂思。這是湯先生留給我們的歷史遺產，失去這三點，一切成功都不足道也！

1984年10月，因有胡耀邦批示，教育部對建立中國文化書院表示支持，時任教育部副部長彭珮雲召集社科司、外事司、人事司的部門負責人開會，並邀請湯一介和北大有關領導前去參會商量。但北大的方案是在北大設一個「虛體單位」，「一切活動均需上報得到批准才能實施」，而湯先生堅持要辦一個獨立實體的中國文化書院掛靠在北大，最終無果而散^⑨。隨後中國文化書院就以掛靠北京高等學校哲學教學協會的方式獨立建院。這是為書院事業確立原點的重大選擇，沒有這個起點，後面的歷史就無從談起。而湯先生堅持開放與融合的風格，不拘觀點，不拘學派，不拘學科，甚至不拘泥於是否限於學術界，在這一點上，沒有人比得上他，甚至此風格一時不被理解。但也正是這一點，造就了書院導師隊伍群星匯聚的格局，開出了此後跨文化研究的新學術之路，開啟了1993年後中國文化書院成為國家一級學術團體的轉型。這兩點是湯一介留給書院的事業遺產，而湯一介的憂思，則是他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

五 湯一介的憂思與我們面向未來的命題

湯一介的憂思首先是他的一個未竟的夢想。1999年8月15日，七十二歲的湯先生給中國文化書院的全體導師和一些來往比較緊密的朋友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對90年代書院平庸的生存狀態的不滿和自責，他說：「主要是由於我作為院長領導不力，而沒有能使書院有所發展。現在將進入21世紀，如果中國文化書院再不能跟上當前發展的形勢，中國文化書院將會被淘汰出局了。」於是他提出一個計劃：創辦一所民辦綜合性大學。湯先生在信後還附了一份他親自起草的「中國文化書院籌建私立綜合性大學的設想」。其中提出機構設置以「少而精」為原則，設董事會、教授會，並設黨委會「監督和保證黨和國家的政策、法令的實行，黨委書記作為董事會成員參加董事會」；「可考慮設五個學院：中國傳統文化（國學）院；跨文化學院；法商學院；環保學院；高科技學院」；「招生人數最大不超過一千五百人（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步驟上希望「用一年時間作好各項準備工作，再用一年時間建校，於2002年招生」^⑩。

2000年1月18日，湯先生寫下〈中國文化書院十五年〉一文，進一步提到辦私立大學的意義，但他在文中也表達了對現實前景的無奈：「這也許是我的一個『夢想』，但我多希望『夢想成真』呀！我當了中國文化書院的院長已經十五年了，想起來真有點慚愧，對不起各位導師的信任，我的這一心情已經



湯一介信件手稿，1999年8月15日。（圖片由陳越光提供）

在8月15日的那封信中表明了。這裏我把那封信和『中國文化書院籌建私立綜合性大學的設想』抄下來，那〔哪〕怕作為一分〔份〕『檔案』存檔也行！」「希望『夢想成真』，即使不成，我也算盡力了。」此事，湯先生認真做過努力，召開各種可能性分析會議，並自己做記錄。他和我說，等他籌到5,000萬元就交給我來辦大學，要求我到時候要全力投入；龐樸還為我分析過校長人選——「自由派」代表人物如何比「傳統派」代表人物更有號召力。但因基本條件不具備，上述設想終究只能是「一份『檔案』存檔」。

近二十年後，我在參與支持西湖大學的事業時，常常會浮現湯先生給我們寫這封信的情景，所以我說：歷史的深邃迷人之處恰恰在於，那些平庸的成功，在成功的同時就被平庸就地消化了，而那些當時沒有成功的崇高目標卻像遠方的燈塔一樣，召喚着後來人。那些超越了成功與失敗的目標，既然以歷史的名義感動了後來人，後來人也終會成就一個感動歷史的故事。

而湯先生這個未竟夢想的背後是他對時代命題的深切憂思。他說：「為甚麼我總是憂心忡忡，一方面我怕失去我們文化的主體性，另一方面我也怕我們不能了解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所以不能不憂心忡忡，因為你面對現實的社會，它的問題那麼多。」^⑤所謂問題，在文化上都會指向二十世紀以來，幾代中國學人學術傳承背後的時代命題：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現代性轉型；通人之學到分科立學的學術範式轉型；傳統士人到現代知識份子的身份轉型。

今天，只要我們還沒有真正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就依然難免在傳統的存續或叛逆間失重；只要我們還沒有拿出全球視野

裏令人敬畏的學術成果——可以讓西方人像我們第一次讀到康德 (Immanuel Kant)，讀到黑格爾 (Georg W. F. Hegel)，讀到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讀到維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一樣，感到震撼的學術作品——就依然要尋思中國學術的現代範式如何確立；只要我們還沒有樹立現代社會公民個體的主體自覺，還不能在知識傳授和社會批評外，承擔對人的終極關懷和社會應然理想建設的使命，就依然要問「何謂知識份子？」

這些憂思今天依然直指人心。所以我說，湯一介的憂思是他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

歷史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歷史不僅是過去發生的事情，而且是可以在今天的人心中復活的過去。

歷史人物所以能感召人，不僅僅因為他們高大，而且因為他們親切，因為他們和我們一樣腳上有泥土，身上有傷痕，內心有夢想、有遺憾，有對未來的憂思！

註釋

① 本文引用資料除已註明外，多出自陳越光：《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化書院》（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5）一書，不再另註。

② 參見湯一介：《湯一介集》，全十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作者簡介」。

③ 參見湯一介先生遺體告別儀式上派發的《湯一介教授生平》小冊子，2014年9月。

④ 楊立華、江力整理編纂，李中華審定：〈湯一介學術年表簡編（2024年版）〉，載湯一介：《儒學十五論》（海口：海南出版社，2024），頁298-315。

⑤ 干春松：〈中國哲學的深度發掘者和當代思想的融會創新者——湯一介哲學思想及其貢獻研究〉，《光明日報》，2023年1月16日，第15版。

⑥ 中國經濟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經濟年鑒（1990）》（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0），第VIII部分，「國民經濟統計資料和專題分析」，頁128。

⑦ 湯一介：〈在中外比較文化研究班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中國文化書院學報》（讀書版），1989年9月10日。

⑧ 湯一介：〈編後記〉，載《中國文化研究年鑒（1989年）》（台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90），頁855。

⑨⑩ 湯一介：〈我與中國文化書院（三）〉，載《我們三代人》（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6），頁335；329-32。

⑪ 雷原、趙建永主編：《湯一介學記》（北京：新華出版社，2015）。

⑫ 香港世界儒學促進會訪京團宴請北京學者時黎昇致辭、湯一介答謝詞，1997年10月16日；湯一介就黎昇食言給當時在場者的通報信，1997年10月20日，中國文化書院檔案第111號。

⑬ 陳越光編：《中國文化書院大事繫年（1984-2014）》（北京：中國文化書院，2014）。

⑭ 湯一介：〈我與中國文化書院（一）〉，載《我們三代人》，頁304-305。

⑮ 汪德邁 (Léon Vandermeersch)：〈中西文化的互補性——與湯一介在北京大學儒學院的對話〉，載《跨文化中國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8），頁24。